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四个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和时代价值

王青^{1,2},高原¹

(1. 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淄博 255500;

2. 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研究院, 山东 淄博 255500)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紧密联系、环环相扣, 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之中。在国内, 建设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 为强国建设提供环境支持、精神认同和社会基础; 在国际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民族复兴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让世界共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四个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与当代重构,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 社会治理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D 6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86/j.cnki.1673-2618.2023.03.002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提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四个共同体。要深刻理解四个共同体理念的基本内涵、鲜明品格及其当代价值, 就必须追根溯源, 梳理其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 阐释其内在的逻辑机理和根本的理论旨趣。

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应然文明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

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 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这一掷地有声的宣言, 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 体现了建设美丽中国的信心与决心, 在全球环境不断恶化与气候日益变暖的背景下, 具有突出的战略意义。

回顾人类历史, 生态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从一个大的时间尺度来看, 这一问题出现比较晚, 是随着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逐步体现出来的。在黑格尔(1770—1831)生活的时代, 虽然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历史不长, 所以环境恶化问题并不突出, 人们盲目地认为已经征服了自然。他在《小逻辑》中指出: “自然对人来说只是人应当加以改造的出发点。……人能超出他的自然存在, 即由于作为一个有

收稿日期: 2023-01-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研究”(19BDJ029)

第一作者简介: 王青(1966—), 男, 山东高青人, 副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E-mail: 1798917509@qq.com

自我意识的存在,区别于外部的自然界。”^{[2]92}在黑格尔那里,人作为绝对精神的承载者,改造世界首先在于改造自然界。人是区别于自然界并高于自然界的——这与西方的传统观念相类似。其实早在古希腊,普罗泰戈拉就曾经在《论真理》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然界中一个独特的并且高于其他自然物的存在;万物的存在都是人的附属,因为有人存在才获得意义。因此,从上古时代到工业革命时期,西方学者大多主张人应该积极地改造自然,进而彻底地征服自然。这些带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思想虽然高扬了人的主体地位,但却贬低了客体的地位,从而缺乏对大自然的敬畏,造成人与自然的分离。

在维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对待自然的方式更加缓和、更加理性。在《庄子·齐物论》中,庄子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在庄子看来,人与万物没有任何区别,是完全一体的。因此,人与万物共同生长,遵循共同的“道”的法则,天道与人道完全相通。虽然庄子追求的这一境界模糊了主体与客体的界限,但可以看出,道家思想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基本情趣。第一次明确主张“天人合一”理念的是北宋哲学家张载,他在《正蒙·乾称》中提出:“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在张载看来,只要对大自然保持敬畏,尊重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律,就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从而成为知天道的圣人。只有个人修养的精进才能知天道,而天道也将促进人道的升华。在张载之后,“天人合一”的思想逐步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哲学自然观的主流思想。对于不同的中国哲学家而言,虽然他们的世界观不尽相同,自然观也有区别,但基本上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人与自然必须相互协调、和谐共生。

在人类思想史上出现过诸多派别的自然观。马克思对于自然界是这样认识的:“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3]13}这就是说,自然界与人类生活密不可分,人是和自然界不断地进行能量交换来维持自身的生存的;如果没有自然界,人类就没有了生存的基础,就无法在地球上生存。在马克

思主义诞生的年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欧洲经过一百多年的充分发展,人类利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步提高。可惜的是,人类在不断地开发自然以获取利益的同时,没有意识到要保护生态环境,其结果只能是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此发出了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4]998}由此可见,我们人类当初所谓对自然的胜利不过是用大量耗费自然资源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其结果是突破生态环境的红线,导致大量的人为灾害。如果人类每前进一步都要以牺牲良好的生态资源作为代价的话,那么我们最终必将遭受生态危机的恶果,地球环境的不断恶化印证了恩格斯的论断。

目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其中,大气污染造成多种呼吸疾病、全球气候变暖造成海平面上升、大量物种正以惊人的速度灭绝……这已经危及我们人类的生存,变为亟待解决的烫手山芋。这些问题都是全球性问题,绝不是一两个国家的单方面责任。因此,各个国家必须订立公约,以约束不必要的污染排放,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携起手来共同保护地球脆弱的生态。中国一直积极参与这样的正义事业,不遗余力地与全球各个国家通力协作,共同治理生态环境,同时进行国内产业升级,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速度明显加快,“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5]458}。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党中央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描绘了绿色发展的美好蓝图。构建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强化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稳妥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

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首先,这一重要理念继承了马克思“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思想与中国哲学“天人合一”命题,以一种崭新的表述明确了人与自

然的关系,是一种用中国话语体系诠释的马克思主义。“生命共同体”说明人与自然唇齿相依,有一种血与肉的联系,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同心圆。其次,这一重要理念有利于增强群众环保意识。这一重要理念表述新颖、贴近群众,使环保意识深入人心。居民环保意识的增强让我国环保事业具有更长远的效果、更根本的作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最后,这一重要理念为世界绿色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发展,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路程,“中国模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深刻变革,党领导人民正在集中力量进行供给侧改革,不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竭力改变对生态破坏巨大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助力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为世界绿色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有助于提升世界人民的幸福指数。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每一个民族都参与其中,需要各民族共同携手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工作,致力于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1]“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表述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重视和对民族团结的信心。早在上山下乡的知青时代,习近平同志就对梁家河村的群众抱有深厚的感情,并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就任党的总书记后,他把年轻时代与群众心连心的作风发扬光大,时刻惦念着各族困难群众。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走访少数民族群众所在的边远山区,慰问当地群众,传达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反复强调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各族同胞都不能掉队。

回顾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在两千多年漫长

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政治与经济的稳固促进了意识形态各个方面之融合,从而使得中国人民有很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早在西周时代,华夏先民便有了文化心理上的自我确认。到了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念更内化为一种自觉的意识,“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其后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之可决也”^[6]₃₇₃₋₃₇₄。由此可以看出: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质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无论他们身在何处,祖国母亲始终都是其心之所归。第二,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作用,这是中华文化的典型特征。所谓同化,是指外来文化进入华夏大地后,融入中华文化,并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同胞与汉族人交往过程中,不仅在生活方面相互影响与融合,在文化方面也取长补短。中华文化的同化作用使得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不仅被中国革命者所接纳并成为指导思想,而且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指点迷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的飞跃、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构建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把中华民族视为“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7]。这个说法十分贴切,形象生动地说明了中华民族作为多元统一体的特点,“不仅与历史发展轨迹相符,而且契合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未来目标”^[8]。在中华民族这个多元统一体中,多元中孕育着统一,统一中包含着多元;多元与统一相互依存,互为前提。因此,我们既不能用多元否定统一,也不能用统一否定多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阐明我们党的政治立场,强调各民族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彰显了博大的胸怀与高瞻远瞩的智慧。我国依然处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这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把56个民族拧成一股绳,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全面发力,系统谋划、统筹兼顾,形成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局面。政治方面,充分发挥党的核心引领作用,继续加强各民族的血肉联系与政治认同;经济方面,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鼓励各民族发挥特色经济优势,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文化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整合不同的价值观念,努力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超越了传统民族自然观、民族政治观和民族大一统观下的语言、地域、文化、族群和国家理念,建构起了更具解释意义和包容性的民族国家观、民族一家亲观和民族命运共同体观的主体、亲情和未来发展新思路和新理念”^[9],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话语体系,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明确方向和科学指引,成为统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基本遵循,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宝贵财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社会治理共同体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营造见义勇为社会氛围,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社会治理共同体是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单一政府治理模式不能满足时代需要与民众需要而提出的。

我国社会治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它是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引领之下构建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社会

治理共同体意指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基于互动协商、权责对等的原则,基于解决社会问题、回应治理需求的共同目标,自觉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且关系稳定的群体。^[10]从治理主体来看,社会治理共同体强调治理主体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从政府单一责任走向“人人有责”的群体广泛参与;从权力与义务的分担看,社会治理共同体强调权力从政府下沉基层,公众承担更多社会治理义务,“人人尽责”的群体介入感广泛建立;从社会治理的受益者来看,社会治理共同体建立的目的是“人人享有”,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社会治理的红利由全体共同体成员分享;从群体相处的原则来看,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基于互动协商、权责对等原则,旨在探索更加和谐的群体关系;从群体的形成过程来看,社会治理共同体要求克服盲目性、形成自觉性,是民众为了自身与群体的利益不约而同自愿形成的,最终达致处理社会问题的自主性。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要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11]338}由此可见,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取向在于形成一个活力与秩序有机统一的社会,实现社会基层的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

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实践课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決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12]28},这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根本路径。第一,党委要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做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顶层设计与整体谋划工作。以党内之治带动社会治理发展,充分落实对相关治理环节的监督与评

价。第二,政府要履行管理与服务职能,压实主体责任。制定共同体的组织构架与运行规则,实施恰当的主体治理行为与公共整治行为。第三,民众要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效能。不断优化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借助各种各样的协商民主平台,广泛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各项事务中来,把党和政府的正确主张形成一致意见、化为自觉行动。第四,坚持用法治思维与方法来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构建系统高效、完整规范的法治体系。以法律或法规的形式进一步明确党、政府、民众等主体责任,特别是要补齐法治短板,提高社会基层综合治理的法治水平,进一步明确政府依法行政边界与民众的自治权限,依法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第五,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科技支撑力。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加快推进数字化政府建设,全面推行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积极推动社会空间数字化、社会服务共享化、社会政策精准化,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的理论价值在于“超越了‘主体—客体’二元划分的思维底板”^[13],凸显了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国家现代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精准地把握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公共性价值诉求,更在于锚定了建构治理主体价值基础、发挥制度优势的实践方向”^[14]。在实践层面,它既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美好生活,奏响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交响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也为世界政治文明探索贡献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我国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秉持的外交理念,这一理念完全契合《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已经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与支持。放眼当今世界,多极化的趋势逐渐形成,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深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相互联系和依存程度空前加深,人类仿佛生活于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判

断,擘画了未来我国的外交方向,铿锵有力地向全世界宣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逾越了几个国家集团之间相对狭小的范围,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格局与气度,是呼吁全世界共同进行的一项伟大事业。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浸润着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思想底蕴,传承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精髓,创造性地开辟了通向理想社会的现实路径。

哲学家康德曾经提出在世界公民观点下,全世界各个国家通过普遍的共和制度并签订相应的和平公约而享受永世和平的思想。然而,康德的历史观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他把这一世界社会的理想看成是大自然的神圣安排,没有对其做出科学的分析,没有提出实践的可行性路径,因此,他得出的结论并不能令人信服,也无法掌握群众。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共同体区分为“虚幻的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是人的自由发展的桎梏,“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15]¹⁹⁹。由此可见,虚幻的共同体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成为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手段;凌驾于人之上的虚假共同体不会给人提供自由发展的环境,只会阻碍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指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5]¹⁹⁹在马克思看来,要实现人的自由,必须通过构建共同体的方式来实现,这一共同体是通过个人联合的方式来构建的。尽管马克思从来没有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但为之努力付诸实践则是确定无疑的。马克思穷其一生都在为推翻资产阶级的虚幻共同体而奋斗,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即真正共同体的理想社会,是其始终深刻关注和思考的核心议题和重要范式,更是其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为此,马克思走出书斋,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亲自领导工人运动并创立“第一国际”,为马克思主义在全

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创造了良好的契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植根于中国文化的理论结晶。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儒家学说作为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主导了中华文化的总基调。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一直提倡积极入世,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始终有一种浓浓的“天下”情怀,即用世之心、济世之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了心系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与担当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被视为理想的人生轨迹、高尚的人生追求。这种忧心社稷民生的情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土壤。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在新的国际环境之下的创新发展。当下世界形势依然充满变数,不确定因素层出不穷,诸如核战争的威胁、恐怖主义的国际化、全球气候变暖、全球网络治理困难等难题绝不是一两个国家就能解决的,需要所有国家通力协作才能找出一致的应对方案。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未来国际社会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唯一选择,也是一种超越各种宗教与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体现了大国担当,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指明了方向。“大国之大,根本上不在面积之大,经济实力之大,而在于国际影响力之大。真正持久的国际影响力,不是来自强权政治,而是来自一个国家的国际威信,而国际威信来源于一个国家的世界贡献与特殊责任。”^[16]我国正在由地区性大国迈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深度介入全球治理体系,引领世界治理格局发生结构性变革。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注意聆听中国的声音,期待中国的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在众多外交场合一再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我们的“朋友圈”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这说明我国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能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在合作中谋求共同发展,以求增进人类的共同福祉。另一方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体现了我国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理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一直是我国的目标。我们需要更加稳定的国际环境促进我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谐的世界实现我们对未来的规划。因此,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营造和谐世界的重要方式,是把我国社会主义的和谐属性拓展于全世界的契机。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大潮滚滚向前,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主旋律、大趋势。然而,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不断蔓延,全球化遭遇逆流。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最积极、最有实力的倡导者、引领者,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因此,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在这样一个挑战与希望并存的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弥足珍贵,其时代价值进一步凸显出来。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一起,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走人间正道,干正义事业,共同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于当代世界潮流,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存续和进步,赓续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源头活水,提出现实版的迈向理想社会的共同体方案,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逻辑与现代人类文明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体。这一重大战略理念“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与 21 世纪的现实世界进行了创造性的结合,激活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生命力,推动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和当代重构”^{[17]133},并且“展示了中国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良好形象,为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指明了正确方向”^{[18]359},为开辟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新的广阔发展前景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已经产生了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五、结语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互相区别、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相互支撑、彼此贯通,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之中。中国梦在宏观层面,表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国

内制约经济发展、制约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棘手问题,其中,生态问题、社会治理短板问题是亟待解决的,而民族团结问题则要常抓不懈。同时,中国梦与世界梦是交相辉映的,我们既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来实现自己的发展,也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世界各国紧紧地连在一起,没有稳定的国际环境,就没有各个国家的繁荣昌盛。质言之,打造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能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

有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牢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中华民族的统一;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有益于增进基层民众福祉,提高幸福指数,营造安全氛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大国形象和国际影响力,为强国建设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四个共同体犹如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四大支柱,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2]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孙金龙.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本书编写组.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6]杨度.金铁主义说[M]//刘晴波.杨度集:1.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 [7]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1-19.
- [8]娜仁琪琪格,王树萌.习近平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及现实意义[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3):20-27.
- [9]斯琴格日乐.习近平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逻辑体系与时代价值[J].科学社会主义,2019(4):111-117.
- [10]郁建兴.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建设路径[J].公共管理评论,2019(3):59-65.
- [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1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13]黄建洪,高云天.构筑“中国之治”的社会之基: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7-17.
- [14]包大为,杨晓彤.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公共性价值理念与实践指向[J].教学与研究,2022(1):43-53.
- [1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6]郭树勇.论大国成长中的国际形象[J].国际论坛,2005(6):50-54.
- [17]王公龙,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18]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

(责任编辑:刘惊雷)